

凝质与流质之间

——康有为、梁启超的个性差异与其不同的政治境遇

王明德

(潍坊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61)

摘 要 康有为、梁启超师生二人各有鲜明的个性。康有为的执着、强毅、自信、自负、有成见、拘文牵义、不为流俗所动等性格特点,与梁启超的多变、机智、随和、无成见、不能持之以恒等个性特征形成鲜明对比,两人的个性差异主要是‘凝质’与‘流质’之间的差异。康、梁的性格特点与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动和失败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又是造成他们不同政治境遇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康有为 梁启超 个性差异 凝质 流质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1-0077-05

康有为、梁启超师生二人并称于世,相映成辉,构成晚清政治风云、学术星空中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却各有自己的鲜明个性,而且反差明显。用康有为的话说就是他为‘凝质’之人,而梁氏则是‘流质’之人。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主要是‘凝质’与‘流质’之间的差异,同时也表现为不变与多变、强悍与平易、自信与随和、执着与灵活、果断与冷静、重感情与重现实之间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梁的性格特点与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动和失败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又是造成他们不同政治境遇的重要因素。笔者拟就康、梁的个性差异及其对不同政治境遇,以及事业成败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凝质”与“流质”之间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于他和康有为的性格特点及其差异作了精辟概括。他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现,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记,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业者亦以此。启超与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尝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定论;启超之学,则未能定论。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

故,往往循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1]。

康有为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也曾说到他们两人的个性特点:“总而言之,汝真一极流之质,吾一凝质,望汝后勿再流而已”^[2]。戊戌时期,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在写给何易一的信中也说到他兄长和梁启超的个性:“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2]又说兄长“思高而性执,拘文而牵义,不能破绝藩篱。”“伯兄思虽高妙,而办事拘文牵义,而志又太高大,恐推行多阻。”说梁启超“熙熙可人,行事如婴孺,性多流质,将奈何?”^[2]具有‘凝质’特征的人,其性格特点多表现为执着、强毅、自信、自负、有成见、拘文牵义、不为流俗所动等。而‘流质’者,则善变之谓也,常与多变、机智、随和、无成见、不能持之以恒等性格特征相联系。“凝质”与‘流质’相反相成,对比鲜明,由此构成康、梁二人个性特征的显著差异。

据万木草堂弟子徐勤回忆:“日本朋友犬养毅曾评价康有为说:‘南海先生为一超越时流之人物,意志强固,毅然行其所信,如领兵者之手执大旗以指挥军士,虽大旗为烈风所吹,然终以强力持之使其飘扬空中,而不被吹倒,亦不因风向之急变,而使大旗有东倒西倒之势,孟子所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南海先生有之,吾子以为何如?’”^[3]对照康有为一生的作为,犬养毅的话可谓精当。康有为早年倡导

维新，不惜与两千年之学术、四万万之时流挑战决斗，以至举国欲杀，千夫唾骂，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他都不为所动，直至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他海外流亡十六年，环大地三周，行六十万里，游三十一国，足迹遍四洲。十六年颠沛流离，绝域穷愁，凄惶万状，依然壮志不改。痛哭秦廷，庚子勤王，保皇救上，立宪救国，屡败而屡起，欲挫而欲奋，知不可为而欲为，由此足见其信念之坚定，意志之强毅，理想之宏远，热诚之深厚，胆气之雄伟。民国以后，又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知不可为而为之，逆潮流而动，助张勋复辟，以至举国哗怪非笑，而他却不以为非，不为自醒。由此也足见其性格之倔强，行事之挚着。难怪弟子梁启超、陆乃翔、陆敦谥等在为其作传时都一致认为乃师是“最富于自信力之人”。梁氏说：“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循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然人有短长，而短即在于长之中，长即在于短之内。先生所以，皆此自信力求之也。盖受用于佛学者深矣”^[4]。陆氏说：“先生聪敏，强记博闻。每读一书，过目成咏，海遇一事，当机立断。虽至繁难者，可以数言了之。故世人之短先生者，谓其刚愎自用，专制武断。人各异心，识之或不无短缺，然天下大事，皆成于强武有气力之人。先生刚健果决，不畏疑难，以摇撼天下，遭患冒险，而浩然不动其心者，皆其最富于自信力为之也”^[5]。

在康有为的性格中，还有许多看似矛盾的地方。正如梁启超所说，康是进步主义者，但同时又是富于保守性质的人，他爱质最重，恋旧最切……笃于故旧，厚于乡情。其外貌似激进派，其精神实渐进派^[4]。陆乃翔等人也说，康“目空群圣，扫尽古今藩篱，排除世宙障碍，六通四辟，自在游行，宜极通脱矣。乃为人行事，又若极拘庸焉：事亲则孝，事君则忠，族姻则亲，师友则笃，执礼抱义，持之极严，守之极毅，不挠不改，有丝毫不肯少迁就者。”^[5]也许这正是真实的康有为。熟悉康有为的人都认为康氏是一位平易近人，古道热肠，以诚待人，前后一致，除非万不得已，不用任何手段的人。他重感情，不重现实，平常不发脾气，但若亲近的人犯了他为人的大原则，也会大发脾气。一旦发起脾气来，家里的人都怕得要远远地躲起来，等脾气一过就没事了^[6]。草堂弟子梁启勋回忆说，康有为中等身材，眼不大而有神，三十岁以前即留胡须，肤色黑，有武人气。拜门弟子刘海粟回忆康有为晚年情况时说，他中上等身材，比

较清瘦，眼窝较深，穿着纺绸长衫，举止洒脱，气度轩昂。他为人刚正，敢说大话，敢负责任，极有魄力，学问渊博，诲人不倦。同时代人胡思敬在《康有为构乱始末》中描写康有为说：顾身修髯，目光炯炯射人。始学经生，继治名法，未乃变为纵横。见人长揖大笑，叩姓名毕，次询何郡邑，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名，储夹袋中^[7]。可见康有为并非那种高傲自负、盛气凌人、难于接近的人。相反，梁启超的外表倒给人一种威严之气，他的严肃神情看起来不像康有为那样容易亲近。他重视现实，有点投机主义，也懂得运用手段。但两人性格的复杂性还在于：康的谦和外表掩饰不了个性中的强悍一面，而梁的严肃之气中不乏平易近人。

二、“变”与“不变”之间

康的“凝质”与梁的“流质”相反相成，相克相生，互为补充。其“不变”与“多变”的性格差异既相矛盾，又相统一。两人既有对“变”的钟情，又有“不变”的操守。他们以“变法”而著名，他们知变、求变、敢变、能变、会变。百日维新时，他们讲求大变、全变、速变、急变、尽变，推动皇帝变事、变器、变政、变法。诚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8]。又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所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9]。一个“变”字包容了他们的理想、追求、热情和冲动，凝结了他们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反映着他们事业和命运的升、降、沉、浮。他们因变法而炳标青史，又因变法而流亡海外。他们讲尽了变法的道理，深通“变”的哲理。他们以“变”去对付“世变之亟”，以“变”去迎接“千年未有之变局”；又以“变”去推动中国社会的变迁步伐。“变”字构成了他们生命的要义，事业的基石，个性的特征。康有为一生讲变、知变、敢变，以维新变法而独领风骚，但有不变的信念与风格。梁启超不仅是变法思想的杰出宣传家，而且本人又以“善变”、“多变”而著称。他的一生是多变的人生，但也有不变的追求与操守。师生二人以变得誉，以变获罪，因不变而毁誉，因不变而落伍。

辛亥革命后两人的不同政治境遇最明显地反映出两人“变”与“不变”的性格差异。康的太有成见、故步自封和不善变等性格特点使他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视现实而不顾，笃信“虚君共和”的政治理

想,以至背时而动,做出复辟清室的错误举动。如果说康有为在海外流亡时期打出保皇和君主立宪的旗帜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尚能争取广大华侨的支持,即使与革命派论战,也易得到人们的谅解,那么进入民国以后,仍念念不忘君主,不忘清室,不忘复辟,坚持认为政治制度的变迁循序而进,甚至以虚君共和对抗民主共和,就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从而也就难于取得人们的同情和理解,甚至被历史无情地抛弃,梁启超与其反目,反衬了康与时代的巨大反差。梁启超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曾提到乃师参与复辟之事:“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其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子而行吾义,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处,拟亦人死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10]梁的话既有对乃师的婉转批评,又指出了乃师的性格特点。且不说政治立场如何,仅就个人操守而言,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也算是忠肝烈胆的大丈夫。康有为行事立身挚着强毅,前后一致,重感情不重现实,甚至蔑视现实,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气概,“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精神。可以说,具备这种精神品格的人,要么立于时代之前,开创时代之先风,成为开创新局的领袖;要么逆时代潮流而动,宁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拉车屁股向后”的好手。而这两种情况都在康有为身上得到体现。康有为的晚年悲剧也许就在于知变不变,故步自封,拒绝正视现实,以不变应万变。梁启超与其师最大的不同乃在于知变而变,当变则变,因时而变,弃旧图新,跟上时代。变与不变的哲学在师弟两人身上演出了两幕悲喜剧。

梁启超的善变性格特点使他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杂政治形势里能够审时度势,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并在某些关键历史时刻作出了重要贡献,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政治智慧。民国初年,他曾一度与袁世凯合作,但当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是他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谴责窃国大盗的罪行,随即与他的学生蔡锷一起,发动护国倒袁运动,成为当之无愧的再造共和的英雄。袁世凯死后,又发生张勋复辟事件。梁启超说段祺瑞举行“马厂誓师”,结束了复辟闹剧,成为三造共和的功臣。梁启超一生波澜起伏,多姿多彩,近代外交家黄遵宪称他为七十二变的孙行者。梁的多变性格表现在政治生活上,至少有十次大的立场转变。其中既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因时而变,如

反袁护国、反张勋复辟等;又有逆势而动的不智之变,如与革命派论战,1912年依附袁世凯,1917年拥段反对护法运动;还有应时而变但跟不上前进步伐的转变,如主张虚君共和,1918年反段等;表现在人际关系上,既有拥袁反袁之举,又有拥段反段之变,对于乃师康有为,也常在分合之间;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其涉猎之广泛,视野之开阔,令人叹服。在政治、伦理学、历史学、文学、经济、财政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都有独特建树或高深造诣。正如他自己所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犹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凡百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之自知之明。”^[11]由此可见,梁启超的人生是多变的人生,但他的多变不是反复无常,不是朝秦暮楚,不是没有原则,他的多变人生中包含着三个不变的追求,那就是他的爱国之心不变、立宪之志不变和新民之梦不变。

从康、梁二人与袁世凯的关系中可看出他们的迥异个性。戊戌政变前他们与袁世凯曾经是变法的同路人,政变后是仇敌,民国初年又成为盟友,洪宪帝制时则势不两立,故与袁的关系有联袁、拉袁、仇袁、倒袁、和袁、反袁等一系列策略变化。康在辛亥革命后虽有“和袁”之策,可他决不与袁共事。先是袁世凯积极笼络他,打电报请他回国,他不为所动,以“十不忍”回绝了袁的邀请。回国后,袁又三电礼聘,都被康回绝。他耻于向袁称臣,由此也足见康的倔强性格和城府之深。与老师相比,梁启超在与袁的关系上显示出更大的灵活性。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他就立即制定出“和袁,尉革,逼满服汉”的行动方针。及袁做了民国大总统,他欣然应袁之邀请,回国参政。1913年,梁在袁的支持下联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组成进步党,以与国民党抗衡。进步党人熊希龄奉命组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其后,梁又出任币制局总裁。他悉心扶助袁氏,本想“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12],实现他的宪政目标。及至袁氏帝制自为,梁奋起反对,与学生蔡锷一起发动护国战争。对袁的两拉两倒,反映出梁氏策略的灵活性,可一旦认清袁氏的本质,又毅然与之决裂,显示出他的原则的坚定性。

康、梁二人的个性差异也可从他们与光绪帝的关系中反映出来。对于光绪帝,康更重情感,而梁则侧重理智。康为报答皇帝的知遇与救命之恩,不但自己不愿革命,还反对弟子革命,发誓决不背叛皇

帝,甚至将对光绪的眷眷之情抽象为对“君主”的忠诚,对旧时代的忠诚,不惜以公意为敌,与潮流决战,以复辟清室相号召。梁感激光绪的救命之恩,但不因报答私恩而害公,不因私情而害志,甚至喊出革命的口号。

三、成功与失败之间

人们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常把维新派领袖人物的个性特点看作是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因素。诚然,康有为的冒险好动性格,大刀阔斧开辟事业的精神,不畏艰难、刚健果决、以旋撼世界的勇气,“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的自信;“横厉无前,好新变异”的品格和“每读一书,过目成咏;海遇一事,当机立断”的敏锐等,是他得以发动和领导维新变法运动的可贵品质。而梁启超的机智善变、冷静现实、平易近人等性格特点对于领导一场全面的变革运动同样重要。两人若能各用所长,相互搭配,必将有助于推进维新事业的发展。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对于顽固守旧大臣,康有为等人多持疾恶如仇的态度;对洋务派官僚如李鸿章等人不是争取建立同盟或促其中立,而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康有为疾恶如仇、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品格值得称道,但不知妥协,不知变通,不会左顾右盼,不会寻找同盟军等,对于改革大局而言,无疑是有害的。到头来只能是孤军奋战,最终以两种势力的过分悬殊及社会现实与改革主张的过大距离而宣告失败。关于这一点,参与变法的康广仁看得清楚,他对兄长康有为及其他维新领袖的个性弱点有深刻了解,还在变法大幕没落定时就说:“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又说兄长“思高而性执,拘文而牵义,不能破绝藩篱。”伯兄思虽高妙,而办事拘文牵义,而志又太高大,恐推行多阻。卓如(启超)熙熙可人,行事如婴孺,性多流质,将奈何?孺博(麦孟华)宝器内藏,人不识之。”^[12]可以说,维新领袖们的性格弱点和政治智慧的不足与变法失败有着一定联系。有论者认为康有为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王者之气,这种王气隐含着不许他人任天下的霸气和轻视“群氓”的个人英雄气。这三气又助长了他的骄气、虚气和躁气,而诸气的综合作用,酿成了康有为领导变法运动失败的个性因素。认为戊戌变法前有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如张謇、汤寿潜、张荫桓等,再加上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之子、曾国藩之孙、左宗棠之子等,康有为若把这些力量统一在变法旗帜下,各用其所长,而不以惟我独尊之霸气视人,则结果可能是维新派内部比较一致,赞成支持变法的许多人不会匆匆离

去甚至站到维新的对立面^[12]。这说明康有为强悍的性格特点有助于开创事业而不利于争取同盟者,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时的变法运动招致激烈的反对,固然是政治利益的冲突,思想观念的陈旧所致,但康有为等人变法策略的失误和过于张扬的性格,无疑地给反对派以攻击的口实。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康有为不那样莽撞、那样强悍、那样感情用事,那样自信,恐怕他也难以发动一场变法运动。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使没有康广仁所说的兄长等人的性格弱点,变法也会失败,但不致于败得如此迅速,如此惨烈。

康的固执与成见和梁的多变与太无成见,不仅不利于维新运动,同样也给以后的事业蒙上了阴影。变法失败后,康、梁在海外组织起保皇会。保皇会以忠君爱国相号召,以保皇保商为宗旨,以维新变法为目标,积极开展保皇救上活动,赢得了广大海外华侨的广泛支持。保皇会的反废立阴谋声势浩大,庚子勤王更将“保皇救上”活动推向高潮。可见,保皇会成立之初确有一股蓬勃朝气,显示出旺盛的政治生命力,实为当时海外第一大政治组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还无法与其抗衡。但武力勤王活动的失败,使保皇会丧失了“保皇救上”的最佳时机,并严重挫伤广大海外华侨保皇救国的积极性,也暴露出保皇会组织的涣散无力和领导人军事谋略的不足,康有为自此不敢言兵事,对于保皇会所宣示的宗旨和目标,除开展立宪请愿、运动倒袁、开放党禁、以金钱收买死士暗杀清廷政要等活动外,只好将光绪复辟付诸卦象,听天由命。

梁启超等人自逃亡至日本后思想日趋激进。变法的失败,勤王计划的流产,清廷的腐败已极,光绪亲政的无望,加上革命派的感召,西方民主学说的影响和青年人特有的锐气等,促使梁启超等人重新思考出路问题,以至有梁启超等“江之岛结义”之举。倾向革命的康门弟子写信给康有为,痛言清政府腐败至极,“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13]。明确劝乃师“息影林泉,自娱晚景”,由他们出来做事。公开放弃维新变法、保皇救上的主张,倡言革命排满,主张用破坏主义方法,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在行动上竟试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实行联合。维新派若能实现与革命党人的联合,康、梁的事业或许会出现一线生机,遗憾的是康有为囿于“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昧于急速发展的国内形势,本着对光绪帝的忠诚与感激,坚决反对保皇会内部的革命倾向,公开发表两封长信《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

自立书》，意在说明中国不可行革命的理由。康有为的苦苦说教和软硬兼施最终使弟子们放弃了革命主张。梁启超本是革命的倡言者，可他的思想常处于一种矛盾变化的状态中，摇摆于革命与改良之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诚如他自己所说：“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1] 1903 年 10 月当他由美洲回到日本后，发表《警告我国民》、《答和事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章，公然表示反对革命，“反对破坏主义”“与共和永别”，这表明其思想言论开始转向保守，并逐渐回到康有为的体系上。康的“太有成见”“太重感情”与梁的“太无成见”“流质多变”，最终使他们放弃了与革命党人合作的机会，从此也就失去了一个重整旗鼓的机会，这就意味着维新派政治生命的结束。当然，康、梁事业的失败不全是由性格所致，但二人知变不变，不变而变，无疑是其致命的弱点。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C]//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2] 康广仁. 与何易一书[C]//张元济. 戊戌六君子遗集. 台

北: 文海出版社, 1966.
[3] 李满康. 康有为先生事迹鳞爪[C]//夏晓虹. 追忆康有为.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209.
[4] 梁启超. 南海康先生传[C]//夏晓虹. 追忆康有为.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34.
[5] 陆乃翔, 陆敦睦. 南海先生传[C]//夏晓虹. 追忆康有为.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95.
[6] 李云光. 康南海先生的报恩思想[C]//夏晓虹. 追忆康有为.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344.
[7] 胡思敬. 康有为构乱始末[C]//夏晓虹. 追忆康有为.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308.
[8] 梁启超. 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C]//梁启超.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7-8, 10.
[9] 康有为. 上清帝第六书[C]// 谢遐龄. 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 上海: 远东出版社, 1997. 342.
[10] 梁启超. 公祭康南海先生文[C]//夏晓虹. 追忆康有为.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157.
[11] 梁启超. 护国之役回顾谈[C]//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86.
[12] 徐临江. 康有为文化个性和维新运动的失败[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3): 94-98.
[13] 冯自由. 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C]//冯自由. 革命逸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简讯 ·

河海大学成立可再生能源研究所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耗剧增，传统能源的不足导致能源危机日趋严重，研究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已成为保障能源供应和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科技攻关和能源建设的重点，国务院批准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对各类可再生能源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河海大学可再生能源研究所根据国家发改委编制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结合学校的学科方向及科研力量，将在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抽水蓄能、生物质能五个领域开展研究工作。

2007 年 1 月 10 日河海大学可再生能源研究所成立，研究所隶属于河海大学科学研究院，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科研人员专兼职结合，由首席科学家招聘并实行合约管理。

(本刊编辑部供稿)

河海大学成立国际教育学院

2007 年 1 月 27 日河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成立。河海大学是我国最早培养外国留学生的高校之一，也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可授予外国留学生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大学。学校从 1954 年开始接收培养外国留学生，50 多年来已为五大洲的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上千名各类人才，很多人回国后成为高层技术专家或管理官员。目前学校的留学生教育以培养高层次人才为主，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 100 余名在校留学生多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河海大学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水教育与研究合作伙伴网络发起单位之一，联合国国际水文水资源及环境培训与研究也设在河海大学。学校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50 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本刊编辑部供稿)